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好长期艰苦奋斗准备

李洪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靠的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这“五个靠”讲得好，不只是脱贫攻坚的根本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的根本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愚公不是智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物质存在，也是伟大的精神存在、文化存在。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中国革命一路走来，新中国一路走来，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新时代一路走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人高

举伟大旗帜，开拓伟大道路，创造伟大奇迹，艰苦奋斗故事，成为中国故事中最有感染力的故事；艰苦奋斗道理，成为中国道理中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动暂时撤离延安后，蒋介石到延安曾专门看了毛泽东住的窑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写了那么多文章，发了那么多电报，调动了千千万万群众，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军队。那一刻，蒋介石的精神和意志完全被摧毁了。人们一直在寻找共产党成功的密码，其实没有什么密码。因为共产党是愚公，不是智叟。有的只是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有的只是同老百姓心贴心、心连心，一块苦、一起干的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这根弦不能松

中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国情是人口

多，底子薄。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中国的社会面貌和国家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底逐渐厚实起来。特别是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但是必须清醒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艰巨的革命性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即使将来强大，艰苦奋斗传统也永远不能丢。尤其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打压围堵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和霸凌行径不会改变，我们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现实的、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艰

苦奋斗这根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松。

始终保持精神状态至关重要

艰苦奋斗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是一种生活状态，但首要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党和国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续写百年华章，牢记初心使命，再创新的辉煌，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好的学习是向自己的经历和历史学习，是跟着实践和时代学习。现在全党正在进行“四史”学习教育，艰苦奋斗精神是贯穿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条鲜明红线。新时代我们要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驾驭把握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好长期艰苦奋斗准备。要高扬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育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高扬革命先烈、老一代革命家和无数英雄模范人物的崇高品德和伟大风范，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政治信念，站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发扬敢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心怀“国之大者”同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团结团结再团结，奋斗奋斗再奋斗，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设主义道路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扎扎实实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者为上海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央纪委驻原文化部纪检组组长）

循规律乘大势 掌握历史主动

陆迪民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学史、知史、明史、用史，唯有遵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趋势、坚持创新发展，才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从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个前进的逻辑、发展的潮流，从根本上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创立和发展、完善，从理论逻辑上讲，都是正确认识、把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这一规律和趋势的必然结果。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行进的中国，如今正站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关节点，面对着更为严峻的风险考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不断抬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还看到，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登高望远，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我们必须更多逆风迎浪的外部环境中开好顶风船，必须在不确定性中确定确定性明显增强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新发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尤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科学部署、精准施策。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同时同赛跑，同历史并进，与时俱进依然在我。我们要更好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更好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强化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系统观念，坚定必胜信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自己事，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乘势而上、启新的伟大征程。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吸收历史养分，回答好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

高仁

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奋斗目标决定了我们党始终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是对贯穿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背后的中心价值的再强调和新发展，为党回归初心使命明确了本源，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第二，从价值取向来把握。一方面，坚守革命理想的价值追求。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我们党在百年征程中领导人民熔铸锻造了许多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精神，形成了一个可以长久滋养后人的“精神谱系”，是我们党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唯有不忘初心，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另一方面，恪守人民立场的价值追求。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人民作为根本力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

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一百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不为一切困难所吓倒、不为一切风险所征服，最终不断开创出一个又一个胜利局面，不断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第三，从历史纵向来把握。一方面，一部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其蕴含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初心和使命贯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过程。正是对初心使命的坚守，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一部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通过发展壮大自己，为世界各国发展创造机会，为世界共同发

展作贡献；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正是对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对民族复兴的执着坚守，对世界命运的责任担当，我们始终占据了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

第四，从问题导向来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同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倾向作斗争，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壮士断腕，敢于刮骨疗毒，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自身必须始终过硬。要把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一刻不停地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更好发挥人物类博物馆作用

吴瑞虎

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是以历史人物为承载的历史传承殿堂，是纪念和缅怀历史人物丰功伟绩的礼堂、弘扬和传承历史人物精神风范的课堂、学习和汲取历史人物经验智慧的学堂，也是我们传承历史文脉、涵养历史思维、培养历史责任、担当历史使命的重要教育场所和培训基地。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更加迫切。

以“人”树人为立馆之本。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的“人”，无论是民族英雄、革命领袖、先驱英烈，还是时代先锋、道德楷模、劳动模范，无论是历代圣贤、各路豪杰，还是各行巨匠、各界精英以及社会名流，他们不仅都有永远闪亮的名字，而且都有永垂不朽的功绩和永不言败的精神，永远为历史所铭记、为后人所敬仰、为后人所缅怀，这是立馆之因、立馆之源，更是立馆之本。

以“物”教人为建馆之基。人物类博物馆应该是所展人物的文物最集聚、解读最权威、评述最专业的收藏、研究、展示和宣教机构。物的搜集、甄别、筛选、保存、陈列都有其基本的规范和内在逻辑，需要每位文保工作者有敬业奉献的精神、精益求精的技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以“史”育人为兴馆之要。在“物”的背后都有着相关“人”特有的历史和故事，更内蕴着时代的进步史、社会的发展史、人类文明的史，包括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史，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构筑出亿万人民的“意义世界”。将这些历史和故事尽可能真实全面地挖掘出来、准确清晰地描摹出来，形象生动地讲述出来，才能“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以“文”化人为强馆之核。透过影像化展示、故事化讲述，尘封的记忆被激活，历史的图景在人们心中铺展，让更多的观众收获“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的启迪，得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的滋养。这就是以“文”化人，“文”指的是文化，文物背后有历史有故事，历史故事背后蕴含着文化和精神。以文化人是指由“物”“史”所体现出的文化来引导人、熏陶人、启迪人、感化人，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浸润、思想得到滋养、境界得到提升。

（作者为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

在抗战时期，我党不仅明确提出利用了利用外债的理论，而且还为了吸引华侨和外商投资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地区（即党领导的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就包括积极吸引海外投资的方针。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封锁，我党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制定法律，提及欢迎海外人士投资建厂。例如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议会通过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1943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通过、1944年2月28日公布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等。

其实，早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讨论怎样答复美国记者斯诺提出的采访时，就曾对“中国是否欢迎外资投资”达成共识，即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对外投资，我们都欢迎。这年7月15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更强调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福尔曼采访时说，在互利的协议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一些外国投资，我们是落后国家，因此，对外国资本十分需要。1945年在为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

抗战胜利前后，就利用外资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社论等渠道，提

出了如下原则立场：第一，利用外资必须时时刻刻着眼于民族产业之发展。利用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促进民族工业的一种辅助，离开这一原则而谈利用外资，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在欢迎外资前提之下，外资可以独立经营，亦应获得合法优惠的利益，但必须与中国民营事业与国营事业配合起来，协调发展。第三，在利用外资时，必须联系民族工业本身的状况，注意保护和促进中国的幼稚民族产业，以避免被外资所操纵，使民族经济遭受破坏。第四，要不怕外资的威胁，就必须有坚强的民族工业，致力于本民族经济的振兴与发展。第五，利用外资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抗战时期，我党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外资的理论，而且还为吸引华侨和外商投资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进行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利用外资的实践活动。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关怀下，1940年9月5日华侨救国联合会是在延安成立，救联会中设专人负责经济建设，经常研究改进华侨工厂的经营管理。朱德十分重视发展延安的华侨经济。1941年初，救联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时，他亲临会议并发表讲话。同年10月5日，他再次参加了救联会第三次大会，对边区华侨筹办的西北华侨公司倍加赞赏。为弥补某些侨资企业资金的不足，1942年，边区政府根据救联会的呈请，决定在本年度14万元

投资额内，调整5万元到10万元，借给西北华侨实业公司，以增强其经营实力。1942年初，《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大纲》要求边区各级政府，应积极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投资，颁布优待华侨投资办法，帮助在延安华侨兴办工商实业，造就便利华侨来边区投资的基础。尔后，边区第六次政务会议讨论了华侨救国联合会呈请帮助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并设工厂的建议，并决定在本年度1000万投资额内，调整5万元到10万元资金，借给该公司作为投资。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奖励实业投资暂行条例》，其中明确宣布：凡自愿投资边区经营各项实业之人民，无论边区内外，或回国华侨，一律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华侨在延安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以延安华侨毛织厂为例，1942年边区工厂生产，当年即获净利润50万元。该厂生产的大批毛毯、毛呢、纺毛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繁荣了边区的工商业。

以上事实足以印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钱锺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评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在回忆杨明斋时，他说：“我过京时正是他的著作《评中西文化观》出版时候，很激动了‘最高学府’的玄学空气。”可见，这本书在当时对理论界震动很大。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李大钊赞誉他“万里拓荒，一身是胆”，周总理赞誉他为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五四”前后，在中国曾掀起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对于这场论战，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在非无产阶级学派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有的学者则认为只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一些短文，共产党人在这场论战中观点不成熟，影响有限。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整理馆藏文献时，发现了一本中共早期党员杨明斋所著的《评中西文化观》。这本专著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参与中西文化论战的有力的文本证明。

这本《评中西文化观》是1924年的初版，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

杨明斋与《评中西文化观》

钱迎春

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希望，才能振兴。书中指出，“要打破那种资本主义帝国军阀，也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

此书刚出版之际，李维汉在《新民周报》上发表了书评，指出“这部书的确是极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波浪甚嚣尘上，真仿是非不易辨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很多的疑难”。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罗章龙